

荣格的理性主义反思及其 对当代中国量化研究的启示

孙秀林

【摘要】荣格对于当代文明理性主义的反思,从文明进程的发生学意义上详细剖析理性主义在当代人心理结构层面的意义。这一理论的价值,不仅仅具有心理学的意义,也可以对其他学科产生有益的启发,尤其是对于当今中国快速发展的社会学量化研究范式的反思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理论工具。

【关键词】荣格;理性主义;量化研究;反思

【作者简介】孙秀林(1978-),男,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空间分析(上海 200444)。

【原文出处】《东岳论丛》(济南),2020.10.124~132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研究”(20ZDA083)阶段性成果。

作为一名载誉全球的心理学家,荣格开创的分析心理学,极大地促进了当代心理学的发展^①。但是,长期以来,荣格更多是作为一名心理学家而存在。荣格的诸多理论观点,比如他对于简单因果论的反思、对于理性主义的反思、对于大众心理的反思等,不仅仅适用于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对于当代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也有非凡的启发作用。

本文试图梳理荣格理论对于理性主义的反思,尤其是理性主义的历史发生脉络,理性主义对于人类心理的意义,以及理性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困境;并将这一反思置于当代社会学量化研究的分析范式中,希望借助这一理论资源为我国的社会学量化研究提供一条反思的道路,在反思中发展出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

当然,本文并不奢望有能力对荣格的庞大理论进行完整梳理,而是仅仅集中于理性主义这一点,对于荣格理论中很多核心概念(如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个体化、自性等等)则一笔带过。挂一漏万,无

可避免。

一、探究意义:中年的反思

《转化的象征》又译作《转变的象征》,这本书在荣格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其自传中,荣格说道:“1912年,我的著作《转变的象征》出版了,而我与弗洛伊德的友谊也至此告終了。从那时候起,我便得单独去打天下了。”^②

《转化的象征》原名《力比多的变化与象征》(1912),后来改名为《无意识心理学》,最终定名为《转化的象征》,并归入《荣格全集》第5卷^③。在这本书的《瑞士第四版序》中,荣格(1950)将这本书界定为“一座地标,矗立于两条道路分岔之处”^④。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正式分道扬镳,也标志着荣格开始摆脱前人的束缚,开始了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论探索。

荣格之所以对弗洛伊德的道路不满意,最主要原因在于他反对弗洛伊德的方法论,尤其是“在总体观念上那种简约式的因果论……一直跳不出陈旧的

19世纪晚期的理性主义……巢窠。”^⑤

在这本书中,荣格旁征博引,将世界各地的神话拆解分析,力图说明核心一点:在人类的心灵结构中,保留着无数来自远古的象征,这些非个体的集体意象,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非理性的;这一点对于心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必须正视这一点,并需要将之纳入分析框架。荣格使用了一个非常优美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个人意识只是一季的花果,由地下的多年生根茎萌发而来;如果把地下根茎的存在纳入认知,那么个人意识便与真相更加相符了。因为根茎乃是万物之母。”^⑥

从方法论上讲,荣格强调非理性要素(如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等)在心理分析中的重要性,试图将非理性主义要素纳入其分析框架中,建立一种总体性的理解框架,尝试为心理学分析营造一种更广阔的背景。

另外一个需要强调的背景是本书的写作时间。本书创作于荣格36岁之际,荣格多次强调这一年龄段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步入人生后半段的开始,是一个心灵转变的关键时期。

在《人生的各个时期》一文中,荣格仔细阐释了各个阶段的心理特征。他尤其指出,人生的中年阶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我们关注儿童阶段与暮年阶段心理问题的时刻,却往往忽略了中年阶段心理的转变。在人生的第二阶段即中年时期(35~40岁左右),经过第一阶段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确定了比较明确的行为理念和原则,就会希望自己前半生获得的东西永远是正确的,并希望自己可以永远坚持这些理念,因此这一阶段的人尤其是男性会逐渐保守而偏执,僵化而狂热:“午间钟声响起,太阳开始下落。而下落意味着所有理想和价值的逆转……太阳陷入了自我矛盾之中。”^⑦

童年时期,人的意识努力从无意识中分离出来;青年时期,人的意识快速成长并占据主导地位;进入老年,人的意识又逐渐淹没于无意识之中,如孩童一般。在人生的第一个时期(青年时期)多关注对于外部世界的征服和个体意识的发展,但在人生第二阶段意义何在?在当代社会,几乎所有进入中年的人都会感觉到生命意义的缺失,尤其是对那些没有经

历过的生命历程,无意识中隐含着心中对于潜在机会的留恋:“因此他们带着不满足的欲望踏入老年的门槛,这些欲望让他们不断地回头张望。”^⑧

如果他们坚持认为前半生的准则仍会在后半生中继续发挥作用,则会遇到无意识的不断损害,从而导致各种心理疾病。在这里,荣格委婉地提出,在人生的中年阶段,文化意义的追求可能是更重要的意义和目的。他引用了宗教对于永生的承诺来说明这一点:唯有超越尘世的指向,方能为这一阶段提供足够的意义。

因此在其个人后期著作的核心文本《红书》的第1章《重新找回灵魂》中,荣格开篇即说:“我的人生刚步入第四十个年头,我已经成功获得我想要的一切。我拥有荣誉、权力、财富、知识和所有人间的幸福。接着我不再有增加这些身外之物的欲望……我感受到了深度精神,但我却无法理解他。而他让我的内心有了无法忍受的渴望……”^⑨

二、理性主义在心理学意义上的发生

在《转化的象征》一书中,荣格为我们仔细描绘了西方文明在过去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明心理结构上面的表现意义和价值。

荣格分析了世界多个民族的神话故事,指出这些神话故事都具有极其相似的结构,并且使用了非常类似的象征符号。在荣格的分析中,不同的形象带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比如黑夜代表无意识;太阳代表意识或者理性;太阳升起象征理性从非理性中分离,意识从无意识中分离,理性获得发展,主体意识增强并与客体分离;中午表示意识发展到达顶峰,开始下降,理性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落日则表示意识消散于无意识之中;经过漫长黑夜的酝酿,黎明代表意识获得无意识的补偿并重新升起。

对神话传说的象征分析中,太阳的例子是荣格经常引用的一个隐喻。太阳神话(或者说英雄神话),体现了意识的发展过程,以及如何走向个体化,其终极目的在于意识如何从无意识中摆脱出来,并进一步从无意识中获得补偿,从而实现意识的重启。荣格用这一结构隐喻了个体人生的各个阶段,也广泛应用于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心理结构特征的分析中。

(一)理性是现代文明历经艰辛的璀璨之花

过去两千年,人类文明的最大成功不仅在于征服了蛮荒的自然世界,更在于征服了人类自己的内心世界。从心理上看,任何文化上的进步都是意识的扩展,都是无意识走向意识的过程。意识的确定性和指向性,是人类付出极大努力和牺牲才获得的性质。只有以意识的连续性和意向性为基础,当今文明才得以可能,现代科学技术文明都以此为基础。

在过去两千年中,西方文化发展出的定向思维(与幻想思维相对应)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心理基石。所谓定向思维,是一种导向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人类模仿客观世界连续性,尤其是按照事物发展顺序组织头脑中意义顺序的结果。定向思维的材料是语言,而语言是一种符号或象征体系,用来表示客体世界在人类心灵中的反应。

定向思维并非自然生成,而是长期文明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技能。与现代人相比,原始人则缺乏这种训练。原始人相信万物都有灵魂,也相信自己的灵魂与万物一样是一种实体。原始人的心智结构中,思维是形象的、可见的,心理事实与感官世界混为一体。在原始人的心智结构中,个体与世界是合一的,个体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很容易迷失(如丢魂等现象的发生)。在原始社会,经常出现灵魂的丧失,就是无意识入侵意识所引发的心理现象。

在原始人那里,来源于无意识的幻想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世俗世界的各种纷杂导致心理能量不断投射到外部世界,这对连续的、有目的的、有指向性的意识发展构成了极大障碍。因此原始人害怕这一感情奔放而来的意识崩溃和涣散,需要努力巩固自我的意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宗教教义和宗教仪式,即是防范无意识入侵的堤坝和墙壁。

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无意识的幻想思维被不断排斥、压制,科学主义的定向思维获得发展,理性成为现代人心智结构中的主导机制,其他心理机能都以对象的形式隶属于理性。具有连续性、持续性意向性的意识,从不连续的、片段式的、非意向性的无意识中发展出来,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如同“岛屿如何从纯本能的一片漆黑中渐渐浮现出来”^⑨。

理性的发展,是西方文明十多个世纪努力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经院哲学和宗教的贡献一直是被忽略的。荣格仔细梳理了理性这一心智结构如何在中世纪基督教和经院哲学的规训下得以发生。

(二)宗教对于理性发展的心理学意义

在荣格那里,基督教的兴起,体现了原始人对于兽性本能和无意识的恐惧,是人类基本需要的结果,具有深刻的理性主义色彩。从西方文明进程意义上,意识从无意识中分离并取得自主发展,应充分肯定基督教的努力。

在自我意识与无意识分离之前,人类时刻面临动物本能的威胁,人类精神处于黑暗状态。基督教的努力,试图建立一种基于理念之上的联合体,通过内在道德标准来驯化人类心中的本能。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一个与外部感官世界对立的内部抽象思维世界。人的思维不再与感官相混合,而抽离成一个独立的存在,进而逐渐具有了反思的能力,从而使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类不再与自然混为一体,而是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自然成为外在于人的客体,人类不在混淆于自然的无意识中,而是时刻用一种反思的目光打量着外部自然世界,在其中逐渐诞生出了科学之光与理性之光。

原始基督教奋力与本能(无意识)抗争,坚决与自然决裂。这一努力结果是人类与现实世界的疏离,追求内在性和抽象精神而背离自然世界。

首先,作为一种替代机制,宗教提供了象征符号来替代个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意象。为了引导力比多的流动,基督教利用人类的创造性想象能力,创造了多个象征模式(原型),将这种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灵性想象强化在当时人们的心灵结构中,并在日常的宗教礼仪中不断加以演练,从而使人们的心灵结构从纯粹本能的无意识世界中解放出来。象征,对应于物质实在,但同时一定是超越任何物质实在。例如神的形象(概念)的诞生,意味着一种最高层次的象征,所有人生的方向都应该朝向这一目标,其他所有路径都将衰落。

从最极端的意义上,基督教要求人类抛弃所有本能,甚至献出生命,以此来迫使人类完全集中于精

神机能,完全集中于彼世的灵性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点,宗教教义必须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必须超越于物质世界,必须是一种超越的象征,在哲学上是不可超越的论述本体,是不可辩驳的。荣格在分析基督教早期思想家的文本中,引用特土良(Tertullian)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一极具悖论色彩的原则:“上帝之子死了;这之所以可信,正是因为它是荒谬的。而且他从坟墓中再次站起;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它不可能。”^[1]

其次,作为一种压制机制,宗教通过不断举行各种礼仪活动来强化个体的内省,来摆脱对于外界的依赖,以此来强化象征理念的实在性。与理性心灵相对应的“退行”心理(又称猿人心理),在任何与外物适应出现问题时会立刻启动,试图重返野性而不羁的无意识状态,这时宗教礼仪就对这种危险性进行打压。同时,基督教将未来许诺给世人,并通过多种方式来确保这一实现的可能性。

在《古典和中世纪思想史中的类型问题》一文中,荣格列举了几个著名的思想家的思维结构,向我们展示了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努力如何压制个体的幻想思维,并发展抽象的理性思维。

基督教的历史表明,这一训练是可行的。使用象征来摆脱本能的“喻象性真实”以及对于人类思维方式和心灵结构进行日常化的定向思维训练,对整个西方文明进程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通过创造宗教神话,给人以内心的安全感,得以逃避上古世界的野蛮和无意识状态。上帝以及整个宗教生活中的各种强力形象,帮助人类心灵抵御住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野蛮入侵,成功帮助人类建立由教义和仪式组成的符号象征体系,使得人类心灵在宗教精神的内省中建立稳定的心智结构,并从中发展出理性之光。

这一艰难的驯化过程持续了十多个世纪,并促进了意识的长足发展,导致在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人类理性思维的爆炸式喷发。

(三)经院哲学对于理性的心理学意义

在理性发展的过程中,不可以忽略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价值。虽然中世纪经院哲学讨论的诸多题目,在当今看来非常荒诞,如针尖上可以站多少个天

使之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辩论过程中,理性的智力机能得以发展,尤其是辩证法的训练,通过给予文字语言以意义和实质价值,使智力日益抽象化、定向化,从而实现人类思维与客体分离,并从中发展出了现代科学方法。

借助这种抽象方法,人类心灵日益脱离无意识状态,日益把客观世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科学归纳法,人类开始使用抽象思维来理解世界运行和人类发展的总体规律,抛离了现实世界的五颜六色的具体过程,而寻求一个抽象的终极真理。

这是一种与原始人极其不同的心灵结构,原始人更倾向于一种幻想思维:意象叠加在一起,按照个人意愿而非现实组织其呈现方式。这一思维在当今世界中的表现形式残留的典型,是个人的梦境和民族神话。在梦中,之所以呈现出一个不可能的世界,正是因为在这种象征背后体现出的思维结构,其兴趣并不在于客观准确地理解真实世界本质,而在于适应主体的主观期望。

定向思维极其消耗心理能量,使用定向思维,代价是一种筋疲力尽的状态。虽然当今我们已经习惯了使用抽象思维来理解这个世界,但这一过程是心灵结构努力刻意维持的结果,是一种人为的而非纯天然的。维持这一思维模式,需要耗费大量的心理能量,任何时候只要稍一疲惫,定向思维对外部现实世界的适应性关注立刻止步,幻想思维(如白日梦)会立刻取而代之、涌上心头。非定向思维(幻想思维)来源于无意识,仍然占据了现代人生活的很大部分。虽然意识的发展与无意识和本能世界逐渐分割,但人的内心始终保留着对于失去世界的渴望,如同怀念母亲的怀抱。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总会希望选择后退到母亲的怀抱中,荣格称之为“退行”心理。

如果没有定向思维(理性思维)对于幻想思维的不断纠正,幻想思维所生成的意象会逐渐占据人的头脑,从而生成一副主观的、扭曲的世界图像。这一不断纠正的能力,来源于中世纪经验哲学长期的辩证法训练,这也是启蒙运动得以发生的心理学基础。

三、理性主义与自身的背离

(一)理性的片面性与大众心理

“真正危险的人物是蜂拥成群的思想狭隘者,唯

理性的知识分子。”^⑫

在荣格看来,理性主义(科学为其代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活动,一种具有创造本性的心理活动,科学和理性都以创造为最终目的。但是不能忘记的是,科学理性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如果忽略这一点,把科学理性作为目的,就会导致世界与人生的决然对立,不仅限制了科学本身(如当代科学体系中具体科学门类的激增和互不联系),而且会侵蚀人的心灵。

现代文明需要集中的、有意向的意识活动功能,但是意识的意向性特征不可避免导致了片面性。科学开启了心智,但危险在于,只是一种新的片面性代替了中世纪的片面性,这种新的片面性就是对于科学和理性的评价过高。在基督教时代,幻想思维被压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自然科学时代,这种压制逐渐成为科学主义的本质要求。科学在使我们获得对于事件真实状态知识的同时,也排斥了自身之外的所有目的。因为在理智那里,其他一切都是幻想。

“‘理性女神’发出的光具有欺骗性,它仅仅照亮我们已知之物,对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意识到的一切罩之以愚昧。”^⑬

科学主义将意识与自然世界对立,在客观的科学研究中,为了科学的客观而牺牲自己的个性,人为训练只发展某一方向的特性,因此现代意识被分裂为碎片,导致人格萎缩。如果理智(意识)无法认识到这一局限性,无法承认生活世界中仍然存在着其他目的,无法承认科学在整个世界中仅仅是作为一个工具而非绝对目的,那么心智结构就会逐渐故步自封,不敢主动改变。

理性成为纯粹的智识活动,变成教条,却对精神性的需求无力满足。人被从自然中独立出来,丧失了与历史的关联,人的生命被物化在一个从生到死的有限范围之内,这种有限性会让现代人明显感受到生命的无意义,心灵的饥渴导致神经官能症比例急剧升高。在当代社会,个体无力在心理上形成庇护自己的机制,个体会追随集体意识和大众心理,会无反思地屈服于社会意识或国家意识,这种大众心理对于个体意义和整个文化构成了严重挑战。

大众群众在个体主观上认同集体意识并完全同

化于集体意识,自我意识完全被集体的想法和倾向所淹没,无条件认同某些真理或主义。对于集体意识的无反思的认同是危险的,这样的认同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不可抗拒的大众心理。

大众心理的危险在于抛弃终极思考,服从大量匿名人群形成的群体。大多数人属于这样的普通人,他们通过完全认同群体价值免于对社会的真正议题进行实质性思考。

乌合之众是危险的。通过神秘参与性的影响及无意识的认同,个体容易将自己的人格上升为更加崇高的层次。但这种集体性团体组织的伦理态度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它可以是崇高的,也可能是动物性的。当个体不加思索接受这一思维时,意味着个体意志的丧失,人们把群体看作一种给定的权利却经常忘记群体正是由于每个个体的努力才得以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存在的根基和尊严被剥夺,个体无法满足自己内心的渺小感和无力感,会丧失生命的意义感,从而越来越依附于集体机构,个体日益成为社会的一个功能,日益丧失其真正的生命意义,这正是各种新形式的“奴役制”道路的开始^⑭。

(二)理性的傲慢与阴影

理性在现代人的心理结构中不断扩展和增强,被赋予前所未有的自主力量,导致理性走向自己的反面,拒绝承认无意识的存在及其可能导致的危险。

理性逐渐成为一种教条,一种盲信,丧失了对于深层结构中象征的理解和信任。在历史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喻象性真实,背后体现的是原始人对于无意识的恐惧,虽然喻象性真实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替代式机制,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这一点。在随后理性主义的发展中,这一点却逐渐被淡忘。理性主义的发展,使得所有不被理解的东西都被抛弃。宗教提供的喻象性真实背后的真实含义首先被抛弃,同时抛弃的还有对于人性本身不可拒绝的“阴影”(无意识,荣格用“野兽”这个词来指称)存在的承认。

对于阴影的忽视与否认,导致西方文明出现各种问题。在个人层面,神经症患者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法使用象征来理解疏导自己无意识中的需求。在国家层面,荣格使用“沃旦”这一形象对德国文明进

行了剖析,并阐述了这一情境下,文明的阴影对人类文明整体造成的破坏。荣格在几篇论述当时政治事件的文章中,反复告诫这种理性狂妄的危险^⑤。

如同个体一般,一个民族或时代也具有自己的“精神核心”(特质或集体心态)^⑥。“沃旦”,一位狂暴与风暴之神,代表了日耳曼民族的非理性的拟人象征原型,隐含了这个民族的深层历史和行为特征,代表了民族的自发心理因素,会对民族的集体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这一阴影代表了民族的另外一方面的本质,无视这一真实则无法真正理解这一阴影会产生如此破坏巨大的道理。日耳曼民族对于无限的索求,对于伟大目标的追求,体现的是一种崇高,但是这种崇高良好动机只是为了否认阴影的存在而提供了一个自欺欺人的借口而已。一战之后,民众个体的脆弱感和不存在感,使得建立一种新秩序的贪婪需求占据了整个日耳曼民族的心灵,由此产生了一个“领袖”。

阴影(魔鬼)从来不会消失,只会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因为它本质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力量。梅菲斯特所代表的并不是暴君的本质,而恰恰是浮士德的“另一面,是我的另一个我,是我很容易就能察觉的阴影”^⑦,当代人的背后都隐含着这样一个阴影。

(三)平均值的心理学意义与学院派专家

在理性主义的思维结构下,基于经验的理论尤其关注统计数据,需要构建一个理想的平均值(理想类型)。虽然这样一个理想平均值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但在人们的心理中却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心理实在,从而具有了理论的有效性,代表了一个社会事实,体现了社会某个层面的普遍性和规律性。

这种基于统计经验的科学抽象主义,是现代人中唯一的知识和权威。危险在于从这一角度出发,任何个体只是一个可以重复的单元,一个“社会单元”,其独特性遭到忽略、压制。在这种知识图景中,展示的是一个理性的世界图景,作为具体的个人和个体事件都被降低。

这样一个基于统计事实所产生的理想平均值概念,对现代人具有重要的心理效果。对当代人来说,在理性女神的凯歌中,具有终极意义的真理必须是统计平均值这样的抽象概念,而不是现实。任何不

符合这一抽象概念的存在,都被排斥为不平常的、奇异的、病态的。在这种情势下,个体的道德差异和心理差异被置于一旁,个体只是作为群体结构的一个单元而存在,个体生活的独特目标和意义并不具有实质价值。

人们越相信大数量和基于统计的价值的重要性,这种被感染的危险就越大,这一逻辑的危险不仅在于剥夺了人在社会领域的自由,而且也剥夺了他们在道德和精神领域的自由。在全体的聚集计算中,个体丧失其个体性,仅仅作为一个统计上的可交换的单元而存在。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这种心理结构会导致学院派的简约化因果论的流行。如果重视个体化,需要处理的知识就需要更加具体,研究对象就更加复杂,个体因素的不确定性叠加所导致的出错概率就会更大,这是学院派专家和机构不愿意看到的。专业化背景下的学院派专家宁愿采用一种简约化的因果论来对待现实世界,从而降低犯错的可能性和概率。在这一思路下,学院派处理的问题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僵化,任何复杂的、不寻常的事物都需要被简化,而只局限于可抽象的、共同的、一般化的情况:“思索太难了,所以不如听从群体的判断!”^⑧

为了掩饰这一点,学院派寄希望于收集更多的数据,希望在这种对于数据的不断累积过程中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但是,人类自身无法确保这一可能性的存在,最终“我们被数据埋葬”,同时“付出良心的代价,因为他会马上只顾数据而忽略道德”^⑨。

四、对我国量化研究的启示

(一)我国量化研究的反思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学的量化研究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在国际学术界的弯道超车。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下面几个因素有关。

首先是国内相关数据库的建设。以2003年开始的CGSS项目、2008年开始的CFPS项目为代表,过去20年中,中国社会学的数据库建设和数据库建设工作取得了极大进展,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者提供了开放的、统一的、标准化的数据库平台。

其次是量化人才的培养。从2010年前后,全国各地的量化研究暑期班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邀请各国学者来讲授世界上最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储备。

再次是学术共同体的规范化建设。各种专业杂志如《社会学研究》《社会》等,近年来发表的量化研究论文与日俱增,这一研究范式的规范化程度也在互相争论中快速提高。从学术共同体来看,中国的量化研究范式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标准的、规范的研究路径,导致青年学者可以快速模仿,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统一化、稳定化、繁荣化的学术共同体。

相比较于传统的手工式培养模式,量化研究培养模式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如数据获取方便、方法论逻辑严密、实证模型具有可重复性、研究思路规范、学术共同体评价标准统一等等,使得量化研究近年来在国内青年学者中越来越受到欢迎。相信未来这种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但是,近年来量化研究也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抛开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意气之争,对于量化研究的批评,背后隐含了这样一条线索:当代中国量化研究者对于自己研究范式的执着,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放弃探索世界的真相为代价的。比如说,量化研究的“看图说话”式模型、只重形式不重实质、缺乏对于现实社会的真实关注,等等。

量化研究使用的数据模型,旨在判断两个社会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也是量化研究的终极使命,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一点必须要建立在对于现实世界具有整体性把握和实质性关怀的基础之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仅仅追求模型的先进性和数据的自我圆融,那么就会变成一种纯粹的“方法主义或抽象经验主义”^⑩,即试图使用一种万能的方法(不管这种方法是理论的、质性的、还是量化的)来处理手头的一切材料,用一个单一的框架来理解真实的社会,而放弃了对于现实社会背后真实逻辑的探索。

这样的研究,不管形式上多么完美,如果缺乏最基本的对社会事实的关注,那么整个学术研究的道德基础被抽离了,这样的研究是不道德的。缺乏对

于基本社会事实的把握,无以应对整个社会对于学术界的现实要求,无论多么复杂的模型,都将仅仅成为一种智力上的游戏,缺乏打动人心的魅力。

以美国为代表的量化研究范式,经历了100年的发展历程,其背后体现了美国学界对于美国社会的把握,以及美国社会对于学界的要求。任何一个广泛应用的模型都体现了某种努力,融合了现实社会的需求以及学界对此的知识反馈。如在早年发展历史过程中的社会测量,不仅体现了对于美国社会基本特征的判断和描述,同时也包含着学界所发展出的一整套应对这种需求的技术性策略^⑪。

这一点在国内现有的量化研究中是比较缺乏的,比如说近年来的问卷调查和数据收集,尚缺乏这方面的努力。在调查数据的获取过程中,为了满足因果判断所需要的复杂模型要求,加入了大量源自西方社会的测量题目,虽然这些测量题目在西方的社会情境中经过了严格的验证,但是这些测量对于中国情境下的可行性以及改进的可能性,则鲜有严格的验证。

这种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复杂因果关系模型,而忽略基本社会事实判断的情况,可以认为是我国量化研究弯道超车的一种代价。必须真实地认识到这一点。

(二)荣格的启示

荣格反对简单的因果论,而希望在实际的研究进程中理解每个心理结构特有的目的和意义。荣格为分析心理学提出的使命是,构建一种对于心灵整体性的态度和方法论。不管对象是宗教还是科学,如果只有信仰,而没有经验为基础,没有能力真正理解,那么信仰只是一种婴儿式的依赖,与原始人的无意识心理结构并无本质区别,这种信仰会对人的深度理解造成障碍。

科学不是一种世界观,而只是形成世界观的一种工具。分析心理学也不是一种世界观,也只是形成世界观的一种工具。对于心理现象的本质、原因、目的,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普遍理论,而更像一个剧场。在剧场上,各种意象交织在一起,这些不同的意象都是某种观念的象征表达,我们需要体验理解并找出这场戏剧背后的意义,建立一种“基于主观的解释”^⑫。

当然,在认识到简约因果论存在问题的同时,并不意味着要否定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价值。荣格并不追求回归传统,而是继续保持现有理性发展水平的同时,认识到人类心理中那些被理性发展所忽略的部分(如无意识、阴影等),理解其意义或者象征,并能够利用现代科学的训练,转化为现代语言。在荣格的著作中,他一直力图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理解很多并不被纳入科学分析范畴的内容(如无意识、梦、轮回、UFO等),使之成为能被现代人所理解、所体验的知识内容,纳入现代人心灵结构的发展中。这种对于人类自身心灵结构另外一面的包容、理解、纳入、整合并再进一步的发展的过程,荣格称之为“个体化”的过程,通过这种个体化,才可以真正获得一种更加圆满完整的心智结构,这是荣格理论的核心意义和根本宗旨,这也是荣格理论留给当代人的最大财富。

荣格的这种对于整体性的要求,对于当今中国定量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虽然荣格是从心理学上来理解现代社会,但我们可以将之扩展到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范式。

对于当代社会学的量化研究而言,我们应该深切理解到量化研究这一研究范式本身的诸多不足(即荣格提到的无意识所表现出来的“阴影”的存在),并有勇气突破现有的研究范式,包括现有的测量、模型、议题等,在反思的基础上,推进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议题的实质性把握。

真正的科学研究,不能使用“本来就该如此”的心态,不能局限于某个特定领域或者方法中不愿自拔,不能永远使用片面性的工具和视角来对待真实社会,而应该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具有某种总体性的把握和理解。无论是采用何种方法和入手点,无论研究的议题有多么微观具体,但研究背后的宏旨应该具有这种整体性把握,研究者应该有自我反思和自我突破的勇气自觉。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对于量化研究的批评,都无损于量化研究为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做出的贡献;任何对于量化研究的批评,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抛弃理性的科学主义思维而进入神秘主义或者不可

知论的泥潭;任何对于量化研究的批评,也并不意味着其他研究范式的自然优越性。

唯有在反思中,方能继续前行。

注释:

①理查德·诺尔:《荣格崇拜:一种超凡魅力的运动的起源》,曾林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②荣格:《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刘国彬、杨德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0页。

③荣格:《英雄与母亲》,范红霞译,申荷永主编:《荣格精选集》,申荷永《导读》,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④⑤⑥荣格:《转化的象征》,孙明丽、石小竹译,《荣格文集》第二卷,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4页,第3页,第4页。

⑦⑧荣格:《心理结构与心理动力学》,关群德译,《荣格文集》第四卷,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271页,第274页。

⑨荣格:《红书》,索努·沙姆达萨尼编译,周党伟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

⑩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徐德林译,《荣格文集》第五卷,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223页。

⑪荣格:《心理类型》,储昭华、沈学君、王世鹏译,《荣格文集》第三卷,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20页。

⑫荣格:《转化的象征》,孙明丽、石小竹译,《荣格文集》第二卷,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95页。

⑬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徐德林译,《荣格文集》第五卷,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76页。

⑭⑮⑯荣格:《文明的变迁》,周朗、石小竹译,《荣格文集》第六卷,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88页,第103-180页,第399页。

⑰⑱荣格:《文明的变迁》,周朗、石小竹译,《荣格文集》第六卷,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60页,第257页。

⑲荣格:《东方的智慧》,朱彩方译,申荷永主编《荣格精选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⑳渠敬东:《笔谈:中国社会科学范式危机——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文化纵横》,2016年第2期。

㉑叶启政:《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㉒荣格:《心理结构与心理动力学》,关群德译,《荣格文集》第四卷,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83页。